

康晓光  
著

# 中国贫困

广西人民出版社

# 与反贫困理论

# 序

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过程,与此同时,一个令人十分惊异的现象是伴随着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的过程。据统计,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30.7%,到1992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降至8000万人,约有1.7亿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并逐步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为8.8%,下降了21.9个百分点。

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已经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绝大多数人口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状况,相当多数的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及沿海发达地区部分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小康水平,少数人口已经过上比较富裕、殷实的生活。这表明,8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均收入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社会发展指标明显进步。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贫困发生率(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许多上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水平。据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估计,1985年发展中国家贫困发生率为33%,其中南亚高达51%,撒哈拉以南非洲为47%,中东和北非为31%。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在大幅度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将近1.7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状况,这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少见的,堪称世界奇迹。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占世界总人口的1/5强,因

此,中国贫困发生率大幅度显著下降,对于解决全球性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中国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呢?绝对贫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发展现象,那么形成中国贫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当中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到不足 1/10 的时候,中国如何进行反贫困行动呢?中国的反贫困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呢?今后在世纪之交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实施更为有效的反贫困战略呢?本书作者康晓光同志对这些问题作了有益探索,紧紧围绕着中国贫困与反贫困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首先,该书是作者的一项专题研究,是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国情调查和国情分析报告。它以中国的贫困问题以及贫困人口作为切入点,来深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重大矛盾及其演变,从而使我们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和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基本贫困状况、贫困成因以及反贫困战略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作者对世界银行、中国政府及中国学者对中国贫困人口分布特征的研究作了详细的介绍,鉴于各方面对贫困人口统计口径以及统计指标的差异性有不同的估计,对此作者按恩格尔系数方法对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作了估计。根据作者研究,1993 年全国贫困人口约 9200 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为 7.8%;其中城市绝对贫困人口约 1200 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为 3.6%;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8000 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为 9.4%;城镇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13%,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87%。这表明,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主要是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减少或消除中国绝对贫困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

贫困人口分布也突出地表现出这一基本特征。作者又进一步对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中国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特征是贫困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中部和西部省份,这些省份既是人均 GDP 水平远低于全国人均 GDP 平均水平的低收入地区,也是我国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居住在山区,部分居住在风沙区、沙漠区和干旱区,这说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国贫困人口自然分布影响重大。这表明中国反贫困战略的重点是这些低收入的贫困程度深的中西部地区,对这些地区实施反贫困如同为穷人“雪中送炭”。

改革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困人口的阶层分布也不平衡,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在中国阶层性贫困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他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相对落后,贫困问题尤为突出。此外,是库区移民中的贫困人口和到城市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口,以及富裕地区的贫困人口。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缺少社会保障,缺乏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在社会分配体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属于弱势集团。

其次,作者独立地提出分析中国贫困成因的理论框架。作者的分析框架是从三个方面,即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以及阶层性贫困来探讨和分析贫困成因的。把分析中国社会重大矛盾诸如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矛盾以及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矛盾与贫困成因探讨相结合,把贫困视为这些矛盾突出作用的结果,又通过分析贫困进一步揭示这些矛盾的本质性特征。这是作者的理论创新之点和独到之见。

中国现代社会基本矛盾是城乡矛盾,即城市和乡村居民

分属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社会,它们的贫困问题的产生源于不同的收入分配机制,既包括城乡之间的不同收入分配机制,也包括改革前后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改革前,从城乡利益集团内部收入分配机制来看,是典型的平均主义,表现为大锅饭,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小;但从城乡居民利益集团的不同收入分配来看,又是极不公平的和不平等的,政府设置了许多人为制度障碍,把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排斥在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保障制度之外,强制性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或者改变社会身分。作者在本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明确提出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是造成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众多的根源。改革以来,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民人均收入的普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贫困,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但是1985年以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减缓,这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重新出现扩大趋势紧密相关。此外,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口从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较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较高的部门流动,从农村向城市流动。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普遍贫困成为欠发达地区一个突出的经济社会现象,作者从区域不平衡的角度并以贵州、广西、云南为例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一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分析了黔、桂、滇三省区的先天不足,这些省区是我国喀斯特分布地区,自然生态条件极其恶劣,社会基础设施极为落后;二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性不平等”的特点,这是指三省区经济发展起点十分低下,“起跑线”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三是从经济结构的角 度分析三省区的工业化程度不高,农业比重过高是

个重要原因。作者还从资本积累、人力资源、社会服务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区域性贫困的成因,同时作者又从体制改革方面的差异性、市场机制的差异性分析了这种贫困落后的制度性成因。同时作者在上述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从系统分析的角度,对这一贫困现象进行反馈回路分析。作者指出反贫困的实质就是要借助一系列社会经济手段,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走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

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过程中,阶层性贫困成为突出的现象,这些贫困群体具有不同的贫困特征和致贫机制,它们是中国社会中的弱势集团,又是社会应该给予格外关注与帮助的集团。作者通过深入贫困山区“访贫问苦”,调查和了解中国农村贫困家庭的基本特征,包括生存环境、家庭人口结构、家庭资产、就业方式、社区基础设施和服务、家庭收入和支出、膳食结构和营养状况。

作者在研究阶层性贫困成因时,专门谈到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到10%,但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为3200万,占全国贫困人口的40%;全国共有592个贫困县,其中少数民族地区有261个,占总数的44%。作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在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中表现得最充分、最集中。

作者积极地探讨了90年代中国反贫困战略以及相关政策。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在反贫困问题上应当发挥哪些作用呢?作者明确指出,一是直接作用,政府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计划,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直接向穷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营养和计划生育,开发人力资源,提高穷人今天的福利水平和明天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二是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政策工具对贫困状况发生间

接影响,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城乡协调发展模式可促进贫困劳动力转移等等。

作者明确地提出,当一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比重下降到 10% 以下时,这部分人口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全面的经济增长摆脱绝对贫困状况。但是只需用社会的一小部分财富就能够使这部分贫困人口过上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例如只要拿出 1% 的 GDP 就可以使我国目前的 9200 万绝对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状况。为此作者提出我国反贫困战略应进行三大转变:一是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这意味着减少和消除贫困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应设有专门的组织机构,专门的经费,有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指导、约束这些机构和经费使用。二是由救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重点发展有助于直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的加工业,发展能够大量安排贫困户劳动就业的资源开发型企业。有组织地组织劳务输出,推进开发式移民,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三是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作者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见地但又是具有争议的口号:扶贫首先不是“扶县”,而是“扶民”,即国家扶贫工作的主要直接受益者不应是贫困地区的各级政府,而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要使反贫困行动收到更好的效果,应当以贫困农户和贫困农户占绝大多数的自然村为对象。

为了实现中国反贫困战略的三个转变,作者又进一步提出,必须在反贫困领域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这包括制定和实施《反贫困法》;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贫困监测系统;建立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资金和扶持贫困人口的资分分流制度;成立扶贫开发政策性银行。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如何有效地实施反贫困战略? 作

者在分析了我国贫困状况的基本特征之后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反贫困战略。一是结构性反贫困战略,这就要求逐步消除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清除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村居民平等参与城市就业竞争;向城乡居民提供统一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最低标准的公共设施,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乡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发展机会。二是区域性反贫困战略,它是针对各个贫困人口高度集中的贫困地区实施的一种区域性反贫困战略。首先是扩大收入战略,打破区域性贫困陷阱,扩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收入;其次是转移人口战略,避开区域性贫困陷阱,有组织地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转移到发达地区去工作或定居,特别是对那些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地区实行开发性移民,这就需要利用发达地区的高速增长为贫困地区人口创造相应的发展机会。需要指出的是,劳务输出也是有成本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了外出打工的门槛,作者发现贫困人口流动性十分低下是因为存在劳务输出的最小成本,即一个在家乡种地的农民如果在外地找到一份工作必须付出的经济代价,他发现当这个农民外出打工的准备资金低于这个数额时则无法实现外出打工的愿望,因此帮助贫困人口跨越这个“门槛”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在调查中发现劳务输出是最有效率的脱贫致富之路,“一人外出,全家脱贫”;“全家打工,全家致富”。对少数民族而言,开展劳务输出有助于少数民族人口提高商品经济意识和现代文明意识。三是阶层性反贫困战略,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为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机会,使他们有效地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通过教育、培训、保健等提高他们的劳动力素质,增强他们利用经济机会和就业竞争的能力;为贫困人



口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使那些因丧失劳动能力、因不可抗拒的自然或社会灾害暂时地或永久地陷入贫困状况的人,诸如残疾人、孤寡老人等,提供基本的需求保证。四是综合性反贫困战略,它既包括反贫困的发展战略,也包括反贫困的制度创新,作者尤为强调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改革以及行政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反贫困的重要内容,它包括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官僚机构实行消肿,改革现有的组织机构,提高扶贫人员的素质等。

总之,《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是一部对我国 80 年代以来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深入总结的专著,又是一部对我国今后反贫困战略和行动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也可以说是我国从事扶贫工作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一份难得的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性的必读教材。在此之前,世界银行曾专门派专家进行调查,写出了中国贫困与反贫困战略问题的调研报告,而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玲博士等就以工代赈与反贫困作了专题研究。1994 年下半年康晓光提出到广西贫困地区挂职,我欣然同意,并提出能否利用此次实地调查的机会,就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个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和分析中国贫困的特征及其成因;从战略研究和政策建议方面提出未来时期我国政府如何有效地实施反贫困计划;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过程中,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涉及社会安定、政治稳定的问题。应当说,作者通过深入实地调查,刻苦钻研,不懈努力,勤于写作,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独立完成了这部著作,这表明作者在了解中国、分析国情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长足进步。

作为一名中国青年学者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治学之路与人生之路呢？这不仅取决于我们个人的意愿与爱好，而且还应取决于社会的需要与发展。虽然我们身居中国科学院这个中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但要走出“宝塔尖”，立足本国，面向现实，参与实践，深入研究，康晓光本人自愿离开北京，深入到中国最贫穷的地区，急他们之所急，想他们之所想。这种治学方法是值得称道的。从这样一部具有理性的学术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对人民之关切，对人民之热爱。这使我想起了周光召院长的一段话：“中国科学院要交穷朋友，帮穷朋友。”康晓光本人正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完成的这部专写穷人、专为穷人而写的著作就是明证。这与今日某些人包括某些学者“爱富不爱贫”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过去曾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只有了解农村，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当我到贵州、广西、云南等贫困山区调查时，发现其贫困的程度甚至超过我20多年前插队的农村时，十分震惊，感慨万千。我在想，我国工业化建设已经40多年了，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为什么这些地区仍保留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仍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呢？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改革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只有了解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我想，康晓光所写的这部书的意义正在于此。今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愈突出，这部书所涉及的问题就愈令人关注，它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就愈明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实行优惠政策和大规模的多方面投入，搞好几个特区，赶上“四小龙”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何使分布广大的不足全国1/10的绝对贫困人口摆脱绝

对贫困状况,进而解决温饱,实现小康是中国最为困难的。显然,作者提出了中国的这个“老大难”问题,无论是对领导人而言,还是对学者而言,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作为一名青年学者,“知难而上”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并不期待着这部书给出最后的“答案”,而期待着全社会能够共同关注这一十分紧迫的贫困问题,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雪中送炭”。我想,这正是作者写作的真实意义。

胡鞍钢

1995年12月 于北京肖庄

# 前 言

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就从未停止过为自身的生存和延续而进行的抗争。对人类生存的挑战不仅来自自然界,也来自人类社会。作为对这一挑战的回应,人类作出了坚韧不拔可歌可泣的努力,不但创造了威力巨大的科学技术体系,还创建了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并使之不断推陈出新、完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人类不断完善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和改进分配生活资料的方式的过程。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一直是人类文明史的主题。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80年代世界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增长,全世界的人均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这种增长并未惠及所有的人,在发展中国家里仍有10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承受着饥饿、寒冷、疾病和愚昧的重压。“80年代是穷人被遗弃的10年”。世界银行认为,对于90年代的各国政府来说,没有什么任务比消除贫困更为重要。1995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大会也把“消除贫困”列为会议的三大主题之一。可以说,贫困和反贫困已经成为90年代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最重大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总量从1978年的25000万人下降到1993年的8000万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绝对贫困人口持续增加的

大背景下,中国能用短短的 15 年时间使绝对贫困人口减少 17000 万,的确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成就。但是目前中国农村仍有 8000 万绝对贫困人口,城市也有 1200 万绝对贫困人口,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近 1/10,占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也将近 1/10。因此,中国的反贫困行动不仅关系到一亿中国人的生存和福祉,对全世界的反贫困进程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994 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承诺:要用本世纪最后的 7 年时间,解决农村 8000 万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 2000 年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社会各界纷纷响应这一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有史以来声势最为浩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反贫困运动。

作为一项目标明确的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始自 1986 年。在将近 10 年的时间里,中国在积极借鉴国际社会反贫困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还创造了许多很有特色的成功的反贫困经验。然而作为一项年轻的事业,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在战略、组织和体制等方面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因此,充分地借鉴国际社会的反贫困经验,系统地分析中国贫困问题的成因,全面地总结中国反贫困行动的经验教训,认真地探索中国反贫困的战略和制度设计,对于中国今后的反贫困行动的成败得失,乃至对于全世界反贫困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是当代社会对学术界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对中国贫困与反贫困进行的系统研究始于 80 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首推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团编写的《中国:90 年代的扶贫战略》和中国学者朱玲与蒋中一合著的《以工代赈与缓解贫困》。前者代表了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贫

困与反贫困进行的综合性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代表了专题性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值得提起的还有中国记者李小林撰写的长篇纪实性报道《历史的期待》,他全面地记叙了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贫困历程。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全面分析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学术著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 二

我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始于1986年,当时我刚从大连工学院应用数学系来到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任教,报到的第二天就奔赴努鲁儿虎山区的建平县参加扶贫工作,我的任务是协助沈亨理教授编制建平县的近中期总体发展规划。当时的县级扶贫规划主要着眼于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调整,追求的目标是生态恢复和社会总产值最大化,对于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很少关注,至于扶贫项目对贫困人口的直接影响,以及贫困人口的受益程度基本上不予考虑。以区域特别是贫困县为直接目标的扶贫战略在这种总体规划中反映得最为充分。

在建平县工作的两个月使我第一次直接地面对中国的贫困。严酷的生态环境,恶劣的生产条件,闭塞的社会生活,极端的贫困,令人震惊的愚昧,还有吸毒、腐败……这一切给我的心灵以巨大的冲击。我第一次真切地认识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有这么多人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之中。他们的生之艰难、生之顽强成为我心中不可磨灭的永远的记忆。

1992年我参加中国科学院晋陕蒙接壤区综合考察队,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的接壤地带进行了为期80天的实地考察。这里是中国西北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也是21世纪中国最大的

能源重化工基地,对这一三角地带发展问题的研究使我触及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四个重大问题:环境与发展问题,二元社会结构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最终归结为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家工业化进程,并分享工业化利益。在两年后完成的《晋陕蒙接壤区能源重化工基地系统模型与发展模式研究》报告中,我明确提出: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必须为当地人民提供充分的参与机会,必须为防止生态恶化提供必要的投入,不能建成“飞地式”的工业基地,不能在取走资源的同时给当地人民仅仅留下污染,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1993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开始第三本系列国情报告《城市与乡村》的编写工作,我承担第三章“城乡关系的成因分析”。我在长达10万字的背景报告《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战略、制度框架和理论模型》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原因、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及其演化轨迹。这份报告为我后来分析中国的结构性贫困的成因奠定了基础。

从1994年年初开始,我和胡鞍钢、王绍光合作着手研究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侧重于欠发达地区的研究。1994年5月,我和陆大道、胡鞍钢、王大生等人对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进行了为期20天的社会调查。在8月份完成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区域发展政策研究》报告中,我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所处的特定的发展阶段,提出了中国的“区域性贫困陷阱假说”,使发展经济学的“贫困陷阱”理论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这项研究作为我分析中国的区域性贫困奠定了基础。

为了更深入地剖析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也为了更直接地参与中国的反贫困行动,我自愿报名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第二届广西科技副职团,于1994年9月赴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任副县长,参与世界银行贷款西南扶贫项目的立项和实施工作。1995年3月改任广西山区开发中心副主任。1995年9月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挂职扶贫工作。

在广西工作的一年时间,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和更方便的条件,深入到中国最贫困的地区的最贫困的农户家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也使我对中国扶贫工作的组织和实施的程序与制度安排有了深切的体察。1995年初,在北京召开的“西南扶贫攻坚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为《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与反贫困》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指出中国的绝对贫困具有三大特征,即结构性、区域性和阶层性;同时在总结80年代扶贫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90年代中国的扶贫战略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光明日报》在1994年2月4日的第一版报道了上述观点。随后全国十几家报刊作了转载。

1995年6月30日,我应中国新世纪城乡发展公司之邀,在中国城乡发展研讨会上作了题为《90年代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的主题发言。《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等报刊给予了报道。这篇一万字的发言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1995年第4期上。

1995年7月,我和沈颖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巴彦淖尔盟和乌兰察布盟进行了为期10天的社会调查。随后又在中央党校与部分学员进行了交谈,介绍了我对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



问题的看法,并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1995年3月,我和郭辉军先生一道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进行了为期6天的调研,在哈尼族、基诺族和傣族村寨中做了农户访谈,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间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

1995年9月下旬开始,我在北京着手分析国内外的有关理论文献和统计资料,整理各个时期在各个地区所做的调查笔记和表格,系统总结了10年来对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理论思考,经过50天夜以继日的奋战,于11月中旬完成了这部书稿。

从落笔写第一个字到完成全书只用了50天的时间,但这50天的写作却是持续10年的思考的汇总。为了写这本书,我阅读了近千万字的理论文献;处理了数百万字的统计资料;进行了上万公里的实地考察,足迹遍及中国的东西南北;与近千人作了交谈,从贫困地区的农民、家庭主妇、儿童、乡村教师、接生员、货郎,到村长、乡长、县长直至省长,还有中央有关部委的领导;还与学术界的同行进行了多次深入坦诚的研讨。在这本书中,我要求自己不但要提出一个分析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理论框架,确认中国贫困问题的特征,剖析贫困的成因,提出反贫困的战略,还要提出构成反贫困战略的具体措施及其实施方法,以及确保反贫困战略得以实现的制度安排构想。我知道这个目标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但我仍然执著地为之努力,只要尽力而为,也就问心无愧了。

古往今来,每一个社会中最响亮的呼声总是强者发出的,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孤苦无助的弱者往往是沉默的人们。一个文明的社会应当帮助这些弱者,关心他们的疾苦,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为这些贫苦的同胞、同类呐喊、奔走、贡献力量,也是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